

#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  
家卓越的领导人、敬爱的  
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

(下册)



20646391

## 长征中我见到的周总理

沈阳部队后勤部副部长 陈美福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了。他那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仍在我的脑海中闪现。特别是在长征的艰苦岁月里，总理那种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一直在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长征的时候，我起初在军委纵队干部团三营当区队长，到毛儿盖整编后，在军委警卫连当副连长，一直担任警卫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的任务。那时，天上每日几十架国民党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在这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我们跋山涉水，昼夜兼程，有时一天要走二百多里路，非常疲劳。总理白天指挥部队行军打仗，晚上还要听取汇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情况，安排第二天任务，处理文件、电报，找干部谈话，翻阅新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报纸，研究敌情动态，常常工作到很晚，有时甚至通宵不眠。每当我深夜查哨路过总理的住处时，总是看见他在微弱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工作着。有时由于极度困乏，伏在桌上睡着了，邓颖超同志叫他推醒，他又继续工作。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是这样，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



646391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们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到达了松潘附近的毛儿盖。毛主席命令我们在这里休整筹粮，准备过草地。这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土地瘠薄，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部队筹粮非常困难，有时只好挖些野菜充饥。一直带病行军的周总理，由于得不到必要的营养和治疗，这时病得更厉害了。我们心里特别着急，到处寻医找药。同志们关心总理，总理更关心同志们。他经常向我们问寒问暖，每当到了宿营地，他总是督促我们烫脚，抓紧时间休息。一次，上级命令我带领一个排，到离毛儿盖一百多里路的红军干部学校宿营地去给总理取药。到那以后，同志们听说我们是从周副主席身边来的，都围上来打听周副主席的身体怎么样。这个学校的领导还交给我们一袋熟干粮粉，让带给周副主席补养身体。我们回到毛儿盖，把药和熟干粮粉递给邓大姐，并说明了这袋熟干粮粉的来历。这时，总理赶忙说，大家都很难，捎这些东西干什么！接着说，既然从大老远拿来了，就分给大家吃吧。邓大姐按照总理的指示，拿出一多半，给我们每人分了一份。我们接过熟干粮粉，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这哪里是一份普通的熟干粮粉啊，它包含着广大指战员对总理的崇高敬意，也包含着总理对下级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后来，在过草地的时候，这些熟干粮粉成了鼓舞我们战胜困难，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北上抗日道路继续前进的精神力量。

我们走出了荒无人烟、泥泞淤水的草地，沿着甘肃南部继续北上。蒋介石急急忙忙拼凑几十万人马，企图在渭水一带攻击，同时派出大量飞机轮番侦察轰炸。这时，总理病得起不了床，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一天，我们走到岷县的一个丘陵地带，忽然听到防空袭的号声。原来是队伍前面的马四、

重暴露了目标，遭到了敌机的袭击。大家担心总理的安全，立即把总理的担架放在路旁的洼地上。六架敌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了一阵过去了，总理的随身参谋陈友才同志考虑担架目标大，担心敌机再飞回来，要把总理挪到沟里隐蔽。可是，总理却坚定地说：“不要管我，你们赶快隐蔽好。”总理的话音刚落，敌机又飞了过来，盲目地扫射一阵，丢下几颗炸弹，就灰溜溜地跑掉了。周总理这种临危不惧，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崇高品德，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在长征的艰苦岁月里，周总理还帮助我们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他经常给我们讲国内外形势，讲毛主席的战略战术，讲人民军队的宗旨，谆谆教导我们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加强革命团结。到达陕北以后，组织上决定调我到独立一师当参谋长。我感到自己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弱，没做过参谋工作，担心干不了。我把这个想法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红军战士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组织上叫干啥就干啥。他耐心地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还送给我一本《野战司令部工作》的小册子，鼓励我在实践中学习，在斗争中提高。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教导，使我思想豁然开朗，愉快地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打那以后，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总理，直到一九五〇年才在大连见到一次。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是周总理来到大连，要见见我。听到这个意外的喜讯，我高兴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一见面，总理和邓大姐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格外亲切。吃饭的时候，总理关切地询问我这些年来的情况，打听当年和我一起做警卫工作的同志都在什么地方。总理一再鼓励我，要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

发扬光荣传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万分悲痛，深切怀念。人面兽心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却利用他们篡夺的宣传大权，极力压制广大革命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妄图贬低和抹杀总理的光辉形象，这只能是痴心妄想。他们越是反对周总理，我们越是怀念和崇敬周总理。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将永远激励我们奔向共产主义。

（原载1976年1月4日《辽宁日报》）

# 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

魏 国 禄

## 给周副主席当警卫员

一九三二年秋天，我们党在江西红都瑞金召开了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运动会。运动会上有射击赛、田径赛和各类球赛等等，特别热闹。当时我在国家保卫局保卫队工作，担任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警卫任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首长作政治报告，话讲的句句深入人心，全能听懂。我深深敬佩这位首长，他知道的事情真多。可是他是谁呢？看来年纪并不很大，为什么留着那样长的胡子呢？后来向别的同志打听，才知道他就是我们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

一九三四年的八月，我才调到中央局工作不久。有一天，我们的李队长找我谈话，说要把我调到总部去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问：“到那里干什么工作？”李队长摇摇头说：“不清楚，你到了那里就知道啦。”当时我不大高兴，心里想：你既然同我谈话调我的工作，怎么会不知道去干什么呢？知道，为什么又不告诉我呢？但转念一想，也许是需要这样吧：在国家保卫局上保密课的时候不是常讲“不需知

者不求知，不应讲者不乱讲”吗？“好吧，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到哪里就到哪里，没意见。”我拖音拉调的回答说。

李队长大概看出了我的情绪，笑了笑给我解释道：“不要不高兴嘛！事情决定的很急，我的确不知道调你到总部去干什么工作。”他停了停又说：“不过，我估计很可能是去给那一位首长当警卫员。”

就这样，当天下午，我整理了一下简单的行装，带上介绍信到了总部。但是，我内心里一直嘀咕：跟哪位首长当警卫员呢，跟首长工作，都是要做什么事呢？我能干的好吗？……总而言之，想的很多，也很具体，甚至将来用什么枪，是快机还是一般的匣子都想到了。一夜都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上午，总部的一位参谋对我简单的说：“调你到这里来跟周副主席当警卫员，我带你去见见首长。”“周副主席？”一天一夜的闷葫芦解开了，我兴奋的用手比着自己的下巴问那位参谋：“是不是胡子搭到这里的那位首长？”他说：“是。怎么你认识他？”我带着一种挺骄傲的神气说：“认识，认识。前年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还听过他的报告呢。”“你也是苏维埃代表？”参谋显出了惊奇的样子。我赶忙向他解释：“不，不，我当时曾担任大会警卫工作。”

他带我来到周副主席的办公室，这时首长正在聚精会神的看文件。仍和一年前我初次看到他的时候一样，所不同的是那身灰军衣已成了白的，显得更旧了。那位参谋向首长说明我是新调来的警卫员之后，又同副主席谈起了别的事情。这时我拿眼扫了一下整个办公室。这是一间不大的江西式平房，收拾得相当干净。屋内陈设很简单，有几把椅子，两张

桌子，一张上面摆着书报杂志，另一张是办公桌，上面一个笔筒里插了几支毛笔，还有一个很大的黄铜墨盒。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我心里想，我们的首长整天为革命事业操心劳累，辛辛苦苦，但他们的生活处处都和群众一样，一点没有特殊。这时带我来的参谋已很快和首长谈完事走了。他一走，不但打断了我的思考，而且剩下我一个人在副主席面前，倒觉得有些拘束了。首长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文件，站起来，先打量了我一下，然后笑着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魏国祿，”我回答说。

“是从哪个单位调来的呀？”说着走到了我的面前。

“从中央局。”

“十几岁啦？”

“十八岁。”

“是党员还是团员？”

“是党员。”我虽然有些不好意思的这样回答了副主席，但内心里却有一种得意的感觉，心情也松畅了，说完后抬头看看首长，他满意的点了点头笑着说：“很好，很好。”接着副主席把早已站在门口的警卫员范金标同志叫进来对他说：“工作问题，你们两个人商量一下，分分工。没有事情的时候好好学习。去吧，带他看看住在哪里。”我向首长敬了一个礼，就随范金标同志走出了办公室。

我到了副主席那里不久，他几乎天天出去开会。白天开会，晚上也开会，不知哪里那样多的会，好象永远也开个没完。首长们开了大约有一个多月的会，到了九月中旬，我发现司令部各单位，每天晚上到了夜静更深的时候，就有人大批的焚烧文件，一夜，两夜，一连几夜的烧，烧个没完。凭



当警卫员的经验，首长们开会与烧文件有关，而这两个现象又说明最近可能要打仗或者有什么行动。但谁也没有透露关于这一方面的任何消息。连通常被认为是“消息灵通人士”的警卫员都不知事情的底细，别人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表面上看来，生活如常，没有什么变化。连总部机关自己种的大片蔬菜，也照常天天有人去浇水、施肥……。

但是，猜测终于被证实了。十月初，周副主席把我和范金标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最近要出发，要走很远的路，让我们把东西收拾一下，作好准备，不必要的东西统统交回供给部。这一下可使我和范金标为难了。副主席哪一样东西是不必要的呢？两条毯子，一条被单，作枕头用的包袱里还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办公室里那个大铜墨盒倒挺笨重，但那是副主席办公经常要用的呀，也减不得。最后只好在那些旧书报杂志上打主意。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十月十八日下午，我们跟着周副主席从西岗梅坑出发，向着零都方向前进。从此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 严惩放火者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长征的红军进入了广西苗族居住区。奇怪的很，自从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十几天以来，每天晚上都有红军驻的地方着火。有时一个村几处起火，有时几个村同时起火。真是“水火无情”，加上苗族兄弟的房子又全部都是草和木头盖起来的，所以，一烧一大片，一个村、几个村都烧成了灰烬。火，成了我们当时很危险的敌人，因为它不仅威胁着我们红军的安全，而且在政治上也给我们红

军造成了重大损失。为了对付这些奇怪的火，部队和机关组织了许多人员做防火、救火工作，把人们搞的精神上很紧张。

有一天，我们在龙坪镇宿营。龙坪镇是一个不小的村镇，房子、街道都挺整齐。在这个镇子上居住的都是僮族。

这天晚上，周副主席是长征以来少有的休息比较早的一个晚上。照顾首长吃饭、休息以后，我们也就很快休息了。经过一天的长途行军，已很疲劳，躺下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夜间十二点左右，我睡的正在香甜的时候，被哨兵的叫喊和“辟辟巴巴”的着火声惊醒，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火势蔓延很快，团团黑烟和股股火舌从周副主席的房门口、窗口往外直窜。我这一惊非同小可，顺手抄起一条毯子就窜进了首长的房子，这时，他正在向外摸，但房内已成了烟和火的世界，根本睁不开眼睛。我把毯子向副主席头上一蒙，便不顾一切的领着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这间房子便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周副主席刚出来，马上就派我们去看其他首长和了解部队的情况，正在这个时候，王稼祥等首长急促赶来。看样子他们也正在为副主席的安全着急。首长们到一块，立即就谈起了失火的问题。

这时候，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有救火的，有找人的，有搬东西的，有帮助老百姓从火中往外抢东西的……。不时还听到人们对于今晚失火问题的议论，黑暗中不知是谁说：“是哪一个不小心，引起了这样一场大火？”另一个人说：“我看这火很可能是敌人放的。”副主席走过来，叫我

去找作战参谋，告诉他命令部队提高警惕，加强岗哨，把没有事情的人员集合起来，待命行动，不要乱跑。

我从参谋那里回来以后，看到几位首长，还有国家保卫局长邓发同志，他们正在露天下站着开会，周副主席在会上说：“……是的，可以肯定这火是敌人放的。万恶的反动派企图用这种卑鄙手段来证实他们那种‘共产党杀人放火’的无耻谎言，来挑拨、破坏我们与群众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彻底揭穿敌人的阴谋！”会后，当天夜里在龙坪镇就查出来三个坏家伙，一个个贼头贼脑，看样子就不是些好东西。经过保卫部门审讯证实，他们是被国民党收买、指派的特务、地痞和流氓，专门混到我们红军宿营地，乘人不备时放火的。

查出了着火的原因，找到了放火者，第二天国家保卫局在龙坪镇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向群众宣传、讲解了红军的政策，彻底揭穿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当老百姓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无不气愤填胸。根据群众的要求，当场就将这三个坏蛋枪毙了。同时，周副主席还责成供给部调查并且赔偿了群众的损失。

从此，敌人这条放火的毒计，以他们自己的失败而告终了。

## 副主席磨稻谷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中央红军长征到了贵州。在进入贵州边境的初期，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破坏，老百姓都不敢接近我们。每到一村，很难找到人，吃的东西就更加困难，连脱米用的水磨、石臼，敌人都强迫老

百姓藏起来或破坏了。阴险的敌人企图用这种恶毒办法来饿死我们长征的红军。

有一天宿营以后，部队搞到了一部分稻谷，可是没有工具磨，脱不出米来，怎么办呢？总不能吃谷啊！有些同志走了一天路，很疲劳，看看没有吃的，索性算了，倒头就睡。周副主席看到这种情形非常着急，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动员干部：“一定不能让大家饿肚子，我们要想办法叫同志们吃上饭。没有东西磨稻谷，就动员大家用石头、瓦片搓，就是用手搓，我们也要把米脱出来！”会上决定，每人要设法脱出够三顿吃的米来。会后，周副主席叫我给他找来了两块瓦片，自己领来稻谷，就在瓦片上搓起来了。他工作那么忙，我们怎么能让他自己搓米呢？就对他说：“首长，你不要搓了吧，我们保证按组织规定搓够每人三顿米就是了。”他头也没抬反问我一句：“为什么？”“您是首长，还有更重要的工作。”我似乎满有道理的说。“正因为我是首长，才更应当搓哩。”说着他抬头看了看我这挺为难的样子，换了比较温和的口气又说：“我提出让大家动手搓米，自己怎么能不搓呢？再者，搓米是为了吃饭，谁能说吃饭不重要？”给副主席这么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话讲了。

在周副主席的号召和影响下，整个村子的部队都在搓米：有瓦片对瓦片搓的；有石头对石头搓的；有人干脆就用手搓。手上搓出了血泡，但仍然愉快的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每个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圆满的解决了吃饭问题。后来，老百姓亲眼看到红军买卖公道，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不打人，不骂人的这些事实，国民党反动派那些恶毒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 “饭撒了是小事”

在贵州境内，有一个时期情况相当紧张，战斗也非常频繁。每次行军，头上都有敌机盘旋、扫射、轰炸、侦察，对部队的行动有很大影响。因此，行军时间大都改为夜晚。

记得有一天又破例的白天行军。这天行程八十里，宿营地是土城。下午三点多钟，离宿营还有二十几里路的时候，人们已很疲劳，机关人员，三三两两，稀稀拉拉的走着。忽听前边锣鼓喧天，齐声呐喊：“同志们别掉队，不远就到宿营地。”啊，原来是宣传队的同志在路旁设立了鼓动棚，在鼓励大家。我心里想：宣传队的同志，真是好样的，他们同大家一样行军，但却象铁人一样，似乎永远不知道疲劳。每每在艰难的关头，他们总是走在别人的前边，用自己的模范行动，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去带动别人，鼓励别人。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有一股敌人从山上冲了下来。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毛主席、周副主席都亲临战场指挥部队作战，花了很大代价，才打垮了敌人。敌人虽然被打垮了，但土城已不能再住，只好连夜继续前进。

这天夜里，天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行军的队伍中，每人背包上都挂着一条白毛巾，后边的人就奔着那块辨认不清的白印子向前走。部队走了一天，还没有吃饭，但行进的速度仍然很快。红军战士那“嚓嚓”的步伐声，冲破了这万籁俱寂的茫茫黑夜。

这天行军，轮我跟挑夫一起走，以便看管副主席的文

件。首长和范金标在前边走了，我和挑夫落在后头。但我手中提了一个三层的饭盒子，里边放着出发时给副主席带的一餐饭，因为打仗，他还没有顾上吃，就又连夜出发了。我知道他一天没吃饭，早就饿了，所以我想赶到前边去送给他，途中休息时吃一点。倒霉的很，我向前跑了不远，一不小心，摔在一块石头上，饭盒子摔出了十几步远，三层饭盒滚了三下，摸了半天才找在一起，饭撒了个净光。我的嘴、手、腿也都摔烂了。这时，我只是着急了，那还顾得了伤疼！副主席那样辛苦劳累，一天没有吃饭，我还把他仅有的一点口粮都撒光了，叫他吃什么呢？想到这里，心里非常难过。我摸了摸身边的挎包还在，不由一阵高兴，因为里边装着我出发时带的一点大米锅粑，想着，我又急忙向前赶去。

大休息的时候已是后半夜一点多了，我赶到了首长身边。范金标一看见我上来了，就高兴的迎过来说：“快，快拿饭来给首长吃。”我象犯了罪一样小声的给他说：“摔了一跤，饭撒光了。”“哎呀！那怎么办？”范金标非常着急的说。首长听到我们讲话走了过来，范金标告诉他，我摔跤把饭撒了。我带着象小孩子弄坏了家中最宝贵的东西来到父亲面前领受责罚一样的心情，走到了副主席跟前，胆怯心虚地说：“我摔了一跤，饭都撒光了。”

“摔的怎么样？能走不能走？”他说着弯下腰看了看我擦掉了一大块皮肉的腿，“饭撒了是小事，看你摔成什么样子啦。”接着又叫范金标找卫生员来给我上药。副主席虽然没有为饭盒的事批评我，可他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呢？卫生员给我上完了药之后，我试探着问首长：“我还有一点锅粑，你是不是吃一点？”他说：“有锅粑？很好，拿来吃一点。”

## 一个负伤的红军

一九三五年二月，我们跟着周副主席从遵义出发，向云南地区前进。到了云南歼灭了威信之敌以后不久，部队又急速转头向东，猛追原来尾随我军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队。这时，天气似乎故意与红军为难，终日阴雨，下个不停。行军途中，道路泥泞，相当难走，尤其夜间，谁要不摔跤，那才真算稀罕事呢！周副主席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向是不骑马的。虽然从遵义出发以后，党中央批准给他一付担架，但从来还没有见他坐过一次，总是戴着他那顶破斗笠，和我们一样踏着泥泞的道路冒雨行军。看到副主席那湿漉漉的衣服，我们当警卫员的心中实在不好受，后悔当初没有给他搞到一把雨伞。

有一天行军快到松坎的时候，天已拂晓，雨也渐渐的停了下来。忽听路旁树林子里有呻吟声，副主席立即停下来，转弯向着呻吟声走去。到跟前一看，是一个负伤的红军战士，年龄不过二十岁，平躺在一棵树下，浑身污泥，脸色苍白，紧咬着牙关，两腿一阵阵抖动，看样子伤势很重。副主席在这个负伤的同志跟前蹲下来，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叫我拿出来仅有的一杯热水，慢慢地给他喝下去。这时候，那个负伤的红军似乎好了一些，坐起来了。从伤员自己的叙述中，知道他是三支队（三军团）的，姓郭，昨天晚上追击敌人的时候摔坏了腿，右膝盖上一片血肉模糊，都露出了白骨。副主席关切的抚摸着他的伤处问道：“疼不？”他回答说：“不疼。”“不疼？能走吗？”首长不满意他的并非出自内心的回答。那位负伤的同志看了看自己的伤处很坚决的说：“能

走。”说着就很艰难的抬腿想起来。但身不由主，他如何能抬得起来呢？副主席急忙按住他，责备道：“同志，你伤成了这个样子，怎么还说能走呢？”“警卫员，叫担架来。”副主席一手扶着负伤的同志，一面回头喊我。

我把担架叫来，副主席亲自把那位负伤的同志扶上去，还在他身上盖了一条毯子。副主席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手是那么轻，动作又是那么慢，好象唯恐触动他一点皮肉引起他的痛苦。看来，这与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果断利落的性格是多么不吻合呀！看到这些情形，我都为首长这种伟大的阶级友爱，感动得几乎流出了眼泪，而那位负伤的同志在副主席扶他上担架、给他盖毯子的时候，却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当副主席叫担架抬起来走的时候，他忽然用手擦了一下眼泪，象入党宣誓那样庄严的对副主席大声的说：“我伤好以后，一定要多杀敌人，来报答首长对我的关怀！”声音是那么宏亮，语调是那么坚决，听来使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身负重伤、刚才还在呻吟的人。党的关怀，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 周副主席在病中

一九三五年六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突破了敌人重兵把守的四道防线，胜利的渡过了号称“天险”且有敌军阻挡的金沙江、大渡河、乌江，翻过了海拔四五千公尺的大雪山，进入了四川的毛儿盖、卓克基一带地区。

我们同周副主席先到卓克基，后又搬住毛儿盖。听说在这里要休整，我们真是喜出望外。的确需要休息了。周副主



席在长征以来半年多的时间里，根本就没有休息，白天和我们一样的行军，晚上住下又要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睡，第二天仍照常行军。有时我们看到副主席太累了，劝他休息，他总是温和的说：“好，我做完了这点事情就休息。”但他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那里有做完的时候呢？住下以后，我们给他烧了些水，让他擦擦脸，洗洗脚，以减少些疲劳，他说：“等一等，我马上就洗。”可是左等右等，等了好长时间，他仍聚精会神的在工作，根本没有要洗的意思。我知道在他思考问题的时候，本来是不应当打扰他的，但是责任感和同情心促使我不得不再一次恳求他说：“首长，再不洗水凉了。”他抬头看看我，才无可奈何的放下手中的工作去洗。吃饭也是如此，热了一次又一次，最后给我们纠缠的没法了，才吃顿饭，有时干脆就边吃边看文件。他睡眠简直少到相当惊人的程度，有时几夜几夜的不睡。实在支持不住了，就附在桌上迷一会，抬起头来接着又工作。有一次，已是夜间两点多了，我劝他说：“首长休息吧，两点多了。”他点了点头说：“我马上就休息，你先去睡吧。”我早上起来，看他仍坐在那里埋头阅读文件，头天晚上我们给他摊的稻草地铺，根本就没有躺过。看到这种情形，我带着埋怨的情绪说：“您，您又没有休息。”他笑了笑说：“是啊，有什么办法呢？赶快弄点水来洗洗脸吧。”就这样，副主席在繁忙的工作、紧张的战斗、行军中，身体一天天消瘦下来，本来就不短的胡子，显得更长了，只有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

到了毛儿盖，首长跟前已有四个警卫员。我们几个人商量，一定要想办法给首长搞些好吃的东西，让他补补身体。但是我们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走了警卫员所能走到